

# 欲望迷途中的精神回归

## ——评李运启长篇小说《迷途》

刘中望, 钟 晴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 李运启长篇小说《迷途》的主人公陈文秀, 其心路历程集中体现了人性与魔性的斗争, 其“迷途”和“识途”不仅是对人生的困惑追问, 更是对当下知识分子存在境况的深刻反思; 在《迷途》的文本世界中, 作者提醒所有身处迷惑状态的知识分子们, 如何站在历史纵深角度去思考出路、寻找药方和获得拯救。

**关键词:** 《迷途》; 知识分子小说; 人性; 魔性

**中图分类号:** I207.4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1)05-0012-03

## On Spirit Renaissance of Desire Lost

### ——Review on Li Yunqi's Novel of Wrong Path

LIU Zhongwang, ZHONG Q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Chen Wenxiu, who is the protagonist of Li Yunqi's novel of Wrong Path, his heart journey embodied the conflict of being humanistic and being demonian, his progress from “losing way” to “retrieving way” is not only a question about the confused life, but also a introspection about the existing situation of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In the text world of Wrong Path, it reminded all the intellectuals which were in flurried condition to think about how to find way out, seek prescription and get save in historical deep angle.

**Key words:** wrong path; intellectuals' fictions; humanity; demoniac

201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李运启长篇小说《迷途》。书中主人公陈文秀挣扎的命运悲剧、知识分子对生活 and 人生的反思批判,使读者深为震动。这是一部颇具震撼力的小说,它立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生活,勾勒出一幅市场经济大潮下知识分子的人生全景图,作品直指人文关怀和信仰重构,负荷着强烈的现实感、真实感和生命厚度。

近年来,众多的知识分子小说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揭露和批判金钱和权力对知识者灵魂和精神

的腐蚀和异化,李运启的《迷途》也不例外,作品以当代社会的各种权力场为背景,精心勾勒出一位知识分子沉沦和堕落的心路历程。作为当下知识分子代表的陈文秀,为了使自己活得更精彩,在都市生活中对生存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在物欲化的现实生存中,陈文秀确实大获成功,但物质及肉欲生活的满足并没有造就其精神品质的升华,他一步一步被魔性所控制,最终在物欲横流的现代都市生存中迷失自我。作者命书名为《迷途》,意在通过小说人物之口、之行、之思,向读者传达自己这种迷失的醒悟和反思。

**收稿日期:** 2011-07-02

**作者简介:** 刘中望(1980-),男,湖南新化人,湘潭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艺学、传播学研究;

钟 晴(1988-),女,湖南湘乡人,湘潭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传播学研究。

陈文秀终其一生都处于一种灵魂放逐和边缘状态。作为一位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他骨子里透着一种知识分子的高傲和热情: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小说中,飞云亭上四少年把酒言歌,畅谈时政,虽然意见不一,但无一例外都有理想有目标,有追求有向往。当时光之河渐渐流逝,多年之后,除樵夫甘居一隅、固守文人的那点矜持外,其他人都被“物化”世界“同化”。主人公陈文秀一直身陷内心的道德谴责和现实物欲的矛盾当中而不能自拔,具有边缘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必须迎合社会的某些阴暗面,却充满反感和矛盾。他的“变节”缘于被逼到走投无路的境况。对于生活,陈文秀有他的疑问:为什么坚持真理却难容于世?坚持知识分子气节不低头、不败节却需屈居人下、饱受冷眼?不欺瞒消费者、合法经营,反而生意清淡、穷途潦倒?当他的生命即将划上休止符时,生活为他开启了一扇全新的窗户,让他得到一次新生,在短暂的“存在”中去思考“此在”的真谛,所有这些疑窦似乎才豁然开朗。

在书中,我们明显感觉到两条线索的交叉运行,一条是陈文秀的奋斗史,另一条是陈文秀的“混斗”史,两条线索的展开呼应着陈文秀的心路历程,即人性与魔性的斗争。从存在论视域来看,人性与魔性意味生命存在的在场与缺席,回归人性意味生命存在的完美展示,魔性侵入意味生命存在无可逃避的诘难。杨向荣博士归纳齐美尔文化发展三阶段时曾指出,“在现代,个体与社会、主体与客体、主观文化和客观文化的同一性被打破了”,货币经济的发展是分裂这同一性的始作俑者,“当个体面对不断增强的客观文化时,要么顺从,要么抵抗,前者会导致对现存社会的盲从,而后者则会导致一种极端主观主义的产生”,<sup>[1]</sup>在齐美尔的文化悲剧理论中,陷于困境的文化似乎在“物化”社会里找不到出路。与之呼应,多年内植于陈文秀身上的“人性”逐渐瓦解,他最终适应和认可了现代生活的“丛林法则”:生活中永远只会有强者的声音,没有人同情弱者,也没有人相信弱者的眼泪,要生活,你就必须“不择手段”。这是多么赤裸裸的生存手段,多么赤裸裸的现代生存格言!陈文秀发现,所有一切都仅是游戏而已,关键是要掌握这种游戏的规则,在对生存规则的适应中,他逐渐步入魔道,不愿、也难以回头。在《迷途》中,这种人性与魔性的斗争在陈文秀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也正是在这种“人化”与“魔化”的双重夹击下,陈文秀最终步入魔道,成为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牺牲品,成为“艾滋病”的隐

喻者。

## 二

在作者看来,艾滋病无疑是对人类的一种惩罚。在笔者看来,这种惩罚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隐喻。艾滋病能使迷失个体的形体走向毁灭而灵魂得以醒悟,身处迷途的知识分子群体何以应对?迷失中的现代文化何以解忧?陈文秀生活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开始进行改革的时代,也是西方文化与观念大肆侵入中国的时代。此时的知识分子接受传统与西学的共同教育,既抱持中华文化遗产的道德尺度、人性修为和价值标准,又受到西方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种种思潮的渗透而逐渐丧失传统尺度。艾滋病的出现让陈文秀真正回归中华传统文化的宁静致远状态,俨如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归隐者,这种状态是一种逐渐平衡主体的本我与超我的过程。在此之前,受浮世欲望的纷扰,为了生存而放弃知识分子的清正以顺应自己内心横亘的欲望,此过程既痛苦又无力,这种建构在道德沦丧基础上的寻求即丧失自我的过程。陈文秀在现实泥淖中越挣扎,他找寻自我平衡的路径就越迷茫。最终,由于艾滋病的出现,使他在所剩无几的生命中领悟存在意义,既无当初年少时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意气,又没有知识分子难容于社会的戾气,有的只是与自然和生命归为大同的和谐之气。

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意指世间万物尽管变化莫测纷纭起伏,但终将回到他们出发的始源。就像小说结尾说的“如一片繁盛后凋落的树叶,一个绚烂后消失的气泡”一样,通过在道观与马道士的一番对话,陈文秀获得思想升华,整部小说主题亦随之凸显:生命与我何为?它消逝时不过是泥土里的一粒尘,天空下的一缕烟,终要回归自然。陈文秀悟到此中真谛,在回归故乡中找到了走出迷途的出路。海德格尔在《人,诗意的安居》中对回归故乡和人性本源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深刻阐述。海德格尔认为,作为诗人,他的天职就是还乡,就是通过归根返本、得以亲近本源。<sup>[2]</sup>海德格尔笔下的诗人,放诸中华传统文化体系中,类同于知识分子。从这一层面视之,中西文化虽具明显差异,但呼吁知识分子本源的返璞归真却殊途同归。可以说,回顾陈文秀的一生,只有走到生命的最后旅程时,他才在故乡静谧的生活中感悟存在与自主,才重拾一份知识分子的旷达与澄净。在这个意义上,陈文秀

的“迷途”和“识途”,已不仅是对人生的困惑追问,更是对当下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深刻反思。

李运启接受采访时曾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明不能没有信念,没有一个统一的信念,没有一个统一的价值观,这个文明就不能称其为文明”。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角度思考,这个统一的信念又在何处?在《迷途》中,作者描绘了陈文秀坎坷跌宕的一生,并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穿插感悟,通过摹写“人”之本我、“人性”之超我之间的矛盾去获得信仰之自我,其本身就隐射知识分子的信念世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这种信念紧密联系对“人”以及“人性”的发掘。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就有对当时国人的“人性”呐喊和国民“劣根性”批判。之后,对“人”的追问一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不曾断绝。当代作家们在不断发现“人”的过程中探寻人的价值、存在意义和精神建构,涌现出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探讨“人”内在精神的文学思潮。由于大众媒介的日益发达、西方文化的不断融入,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对物欲权力的赤裸裸追逐不断进入中国作家视线及其作品中。不可否认,西方文化的融入大大提升了中华文化文本的多样性、内容的丰富性和内涵的深远性,但这种渗透也使中国作家逐渐丧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质,在西方文学和民族文学的混融中失去方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迷失也大大抑制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膜拜和学习,使这些作品几乎不能从灵魂深处发掘生命的厚度和中国文学的厚度,使中国文坛向着一条不知名状的晦涩之路发展,文学“必须适应于新环境、新要求,并在这种适应中得以发展,从而获得某种创新性”。<sup>[3]</sup>

### 三

审视古往今来的文艺作品,大凡优秀的小说,都有其独特风格,一般很难简单归为这一派,定为那一尊,但他们同时也具备共同的特质,即丰富的内涵、立体的意蕴、深沉的思想,“从纵向看表现多层次,从横向看表现出多侧面,从内涵看表现出多意蕴”。<sup>[4]</sup>否则,难以流传久远,成为艺术经典。在这一点上,《迷途》也是如此。作品呈现出的主客冲突、生死对抗、情欲纠结、城乡对立、道德困境、悲剧范型、生命伦理、人性关怀等众多主题,凸显了作品强烈的现实感、突出的写实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不同阶层、侧面、视角与立场去彰显人的生存状况和价值实现、重构人文精神,显得急为迫切。

《迷途》对社会责任感呼吁和对个体迷失的忧患等,正是这种人文精神的体现。作为出生于20世纪50-70年代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一个标本,小说主人公陈文秀堪称典型。通过叙述陈文秀身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小说摹写了多种人生路线的冲突与对抗,重点批判了经济模式的唯利、权力模式的异化、身体模式的虚无、个人模式的无序。与之对应,作品花费不少篇幅,以动人的语言、优美的意境,礼赞了亲情的温暖、爱情的神圣、友情的真诚。在社会飞速发展与急剧转型的今天,这些东西显得弥足珍贵。在作者看来,它们也许就是解决当今社会遇到的各种问题(比如浮躁迷茫、理想消解、道德虚无、诚信缺位等)所必需的疗方和润滑剂。中国的现代化不仅需要向前的力量、波澜壮阔的气势,也应该汲取古人的智慧,诸如心灵的坚毅、诚实的自省、澄澈的守静、欲望的控制,这些都有益于现代文化的恢复和重建,有助于建构新的人文精神。在《迷途》的文本世界中,作者提醒所有身处迷惑状态的知识分子们,如何站在历史纵深角度去思考出路、寻找药方和获得拯救。小说结尾,回归自然,回归中华传统文化母体,成为作品的最强音。这种艺术处理负荷了作者的希望,“文学固然是他们反抗正统意识形态的武器,也是他们心灵依托的圣地”,<sup>[5]</sup>点明了小说主题,可谓意义重大,深意存焉,引人思索。

### 参考文献:

- [1] 杨向荣. 现代性和距离——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齐美尔美学[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79-80.
- [2] 海德格尔. 人, 诗意的安居——海德格尔语要[M]. 郅元宝, 译. 张汝伦, 校.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5: 86-87.
- [3] 刘中望. 历史语境与思想旨趣——毛泽东与瞿秋白文艺理论比较研究[J]. 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3): 117-120.
- [4] 季水河. 回顾与前瞻——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及其未来走向[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243.
- [5] 李阳春, 李宇梁. 20世纪政治小说的生存语境与书写情态[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5): 56-60.

责任编辑: 黄声波